

刁艺录

萧殷

东人民出版社

习 艺 录

萧 殷



目 录

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	1
砌砖铺瓦的精神·····	11
二者必舍其一·····	14
从生活出发·····	20
人物、情节、主题·····	24
人物和故事·····	29
素材·题材·积累·····	37
形象和构思·····	42
谈谈写孩子·····	49
习艺录·····	54
谈练笔·····	59
狠批“三突出”，努力创造高大的英雄形象·····	62
是“英雄典型”，还是阴谋家的形象？·····	78
生活的火花·····	86
关于散文的立意·····	107
如何反映阶级斗争·····	112
关于戏剧创作的几点感想·····	127
后记·····	145

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三十五周年

一

远在四十年代初期，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向我们提出创造真正无产阶级文艺的课题。同时指出，要完成此项任务，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过来，把立足点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里“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并指出“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自毛主席发表那次讲话以后，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光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深入生活、深入斗争实际和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社会等），在世界观改造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创作上也产生了一

些较好的作品。但在进城以后的一段时间，因受到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干扰，在创作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作品，在工作中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错误理所当然地受到严肃的批判，使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受了一次严格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在政治觉悟上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但还来不及把提高的觉悟在艺术实践中体现出来，即还来不及把认识付诸实践，而“四人帮”却篡夺了文权，控制了文艺阵地，对年老的和年青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践踏和迫害。虽然老妖婆江青之流曾高唱过什么“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其实他们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他们从来不敢提一句深入生活，也不敢说一声思想改造。是的，那个老妖婆曾胡诌过什么“我要从艺术实践中把你们的世界观拉过来”，这是句什么话？她要把人们“拉”到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去呢？只要看看她自己朝夕所醉心的是什么生活、什么趣味，你便什么都明白了。如果还不很明确，那就看看他们在文艺领域中肆意扩张资产阶级法权、拚命扩大等级差别、大搞“三名三高”、用“高官厚禄”“封官许愿”作为诱饵去腐蚀、分裂文艺队伍的种种勾当吧！事情已经十分清楚，他们的目的是培植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为篡党夺权准备反革命吹鼓手和啦啦队。还应当看到，在他们“拉”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着“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可贵的革命品质，不上钩，不上当；可是也有一小撮利欲熏心的小丑，想讨得主子欢心，竟不择手段，上窜下跳；竖起两耳，吠形吠声；偶有所闻，即掐头去尾，张冠李戴；写黑信，告黑状，终于

成了反革命黑帮的哈巴狗。这类家伙大概还是“炮制”赵昕、江涛一类反革命“英雄”和“内奸典型”的能手，因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主子都是惯于搞阴谋诡计，惯于制造事端、嫁祸于人的人，对这方面的生活何止熟悉，简直是每条神经的跳动他们也了如指掌。但是，只有白痴才会把创造无产阶级文艺的神圣职责寄托在这些灵魂肮脏、品德恶劣的哈巴狗身上。因而，从老妖婆之流的狗嘴里所吠出的什么“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纯粹是骗人的鬼话，是捞取政治资本的鬼蜮伎俩。

值得欢欣鼓舞的是，那几条横挡在文艺大道上的拦路毒蛇——“四人帮”已被敲碎了脊梁骨，象几条死蜈蚣那样被踢到一边。阻力已除，形势大好！值此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振奋！特别高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创造真正无产阶级文艺的课题，应当是我们全体革命文艺战士全力以赴的工作，我们应当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帮助下，努力把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都推到一个更新的水平上。

二

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文学。这种文学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之，它首先要求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真实地正确地反映这个历史时期新旧更替

的新社会的生活面貌：不仅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新人物和新思想应当得到热情的歌颂和深刻的描写，当然，在反映生活上这是主导的重要方面；此外，那些在新事物、新人物的较量之下而衰败下去或消亡下去的旧社会余孽，也应当予以适量的反映，当然不应当孤立地去描写它们，而是在斗争中、在消灭它们的过程中去“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因为反映腐朽力量的灭亡，正可以显示革命阶级的胜利，描写旧事物的必然失败，正是歌颂新事物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其目的是长无产阶级的志气，灭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的威风！对于那些正在变化、发展的事物以及那些在新社会影响下，由蒙昧状态逐渐觉醒的人们，也不应排斥于文学之外。毛主席说过：“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描写他们的目的，正是引导、鼓励他们向无产阶级靠拢，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最后达到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毛主席接着又说：“……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无论是反映哪方面的生活，但有一点必须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必须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因此，必须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利于巩固共产党

的领导。从作品来说，作者必须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观察生活、判断生活并描写生活。只有这样，你对人物命运以及对矛盾冲突的处理，才可能是正确的，才可能恰当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因而才可能使读者得到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

这样的文学，不单要求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时期新旧更替的生活和斗争，而且还要求它们能反转来教育人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并激励人们更加仇视一切破坏革命事业的阶级势力和反动意识。

这种带着浓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和意志的文学，只能产生于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作家之手。因此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既然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彼此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连话也没法谈得拢，谁还愿拿心里的话跟你说？这一来，你便无法摸清工人农民的内心世界，也就没法进入创作过程。就退一步说，你可能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得到一些很不错的生活素材，可是由于你的世界观没有改造，思想感情还是旧的，试问，这种旧思想、旧感情如何能同革命新事物、新人物的素材相融合？主观的思想感情与客观的生活素材，如果不是水乳交融地融合，形象怎么能创造出来呢？艺术构思——包括矛盾冲突的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处理——又如何进行呢？这种种情况说明：要创造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作者就一定要把过去陈腐

的那一套去掉，非换一个无产阶级世界观不可，否则，所谓创造无产阶级文学，只是空谈而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这说明要把旧的一套抛掉也不是容易的，只有在剧烈的革命运动中才有可能；但也只是“可能”而已，还不敢说每个人都能在这过程中把陈旧的东西抛掉。因为所谓陈旧的感情或肮脏的思想，通常是指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和强烈的占有欲等等，（谁敢说自己处在剥削阶级统治下没有受到过这类思想的影响呢？谁敢说即使在剥削阶级统治被推翻、而其影响还存在的今天就没有这种影响呢？）而这些思想恰恰是革命者应该抵制的，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当革命烈火向这类陈腐思想猛烈地燃烧过来时，有一种人这类思想比较严重，对革命又不那么迫切，面对着这场革命烈火，他始则畏缩，继而动摇，最后离开革命完事。另一种人，也有这类思想，但比较轻微，而对革命的要求却很强烈，面对着这场革命烈火，开始感到有点不习惯，经过内心斗争，最后果敢地摔掉这思想包袱，奋勇向前。

不管在改造的道路上还可能遇到什么情况，而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

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三

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观点和情绪，都是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障碍，因为这些思想感情代表着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和立场；是与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相对立的另一种思想体系所派生的。譬如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只符合剥削阶级的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相容的。倘若用这种所谓普遍人性的观点去塑造新的英雄人物，显然只会牛头不对马嘴，结果很可能衣服是无产阶级的，灵魂却是地主的或资产阶级的。用这种观点去观察新社会的新事物，不仅不能正确地判断事物和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反而可能受到严重的歪曲：因为所谓普遍人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是不相调协的，从人性观点去看社会斗争（主要是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对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不但不能被理解，反而可能被看成是社会的黑暗面，甚至被当作丑恶现象加以恶意的渲染，这哪里还谈得上正确地反映我们新社会的面貌和歌颂我们时代的新人物呢？

又譬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是与我们社会主义以集体为核心的思想不相容的，这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根本标志，一种为他自己和他一小撮人的私利奔走，一种则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如果从个人主义角度去观察、描写社会主义的新事物和新人物，当然得不到正确的反映：因为从个人主义角度去看人，他们就认为人有私心是天经地义的，追求个

人舒适也是人之常情，因此，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公尔忘私”的人是没有的；只为别人、不为自己的人也是不存在的。但他们认为这样的“先进人物”大概是有的，那就是既有进步思想，也有落后意识；既有社会主义观念，也有个人主义欲望。在他们看来，也只有这样的“先进人物”才是可信的，倘用这样的观点来判断和描写我们社会的新人物，岂非笑话？

其它，如悲观厌世思想、田园风味或牧歌情调之类，都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感情，都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

现在的确有些人很警惕人性论或个人主义之类的思想侵入创作，这些人在抽象的概念上也懂得一些新事物、新人物的主要属性或主要特征，可是他们旧的一套思想感情却没有甩掉，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又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之当他们提起笔来，却很少真情实感；他们笔下的人物，只会说些作者要他说的话和做些作者需要他做的事；除了表面，却触不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更感不到一个有个性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如果是诗，除了高昂的激情的辞藻之外，也触不到动人的意境，总之，一切都很一般化，也很概念化。

是什么原因呢？前面已约略谈到，关键还是由于作者的思想感情没有改造，立场还没有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因而不能用无产阶级的心灵去吸收、提炼、融化生活素材，当然也就不能创造出既有阶级特征又有鲜明个性的形象了。

实际上，从深入生活到进入创作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

感觉、感受、选择、概括、提炼、构思、塑造或描写……都离不开“心灵”的支配和作用。在这里我为什么不直接用“思想、观点”，反而借用“心灵”这个词儿呢？不外是想强调表明：我想说的思想观点不是那种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而是一种经过自己消化、同自己的感情、情绪水乳交融在一起的思想观点。

所谓“心灵”作用于素材，是什么意思呢？这两者的关系就象高炉同矿石的关系一样，如果没有高温的熔炉，并经过熔化过程，尽管再好的矿石，也不能转化为铁。又象蜜蜂身上的蚁酸那样，尽管花粉很好很多，但如果没有蚁酸与之融合，花粉还是无法转化成蜂蜜。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革命的“心灵”，尽管好的生活素材十分丰富，也无法塑造出既有共产主义灵魂又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一个作家如果缺乏远大的革命理想和抱负，他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革命浪漫主义。这样，他就只能象一架装着蹩脚的彩色胶卷的照相机那样，虽然面对着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可是由于胶卷上缺乏某种感光质（比如红色），它对客观事物或人物的某种（红）色素，已失去感应作用，结果，虽然按了“快门”，胶片还是无法把事物的面貌正确地反映出来。凡是优秀的胶卷，都具有灵敏的感应作用，这种良好的感光质，就象生根在你“心灵”里的广阔的胸怀、宏伟的气魄、远大的理想、极端信任群众、必胜的信心、藐视困难、乐于革命、勇于斗争、灭旧建新的光荣感等等一样，只有这样的“心灵”（无

产阶级世界观），对出现在社会上的带着共产主义因素的新人物、新性格、新关系和新风气……你才能灵敏地感觉到，才能经过形象思维，经过集中概括以及典型创造的过程，把崭新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诗也是如此，只有你在心灵深处有一股炽烈的热望，把革命战争看作不仅能把奴隶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而且还能打出一个新世界来，只有在这股热望之下，你才会满腔热情地去歌颂革命战争，才会把革命战争看成为最壮美、最诗意的场景。也只有有这样欢悦的情绪下，才可能写出“战地黄花分外香”、“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和“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一类歌颂革命战争的诗句。只有对革命满怀信心、怀着一往无前的豪情壮志，才可能产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等的豪迈诗句。

不管是艺术形象或者是诗的境界，都不是靠华丽的辞藻，激昂的高调或动人的口号，而是靠深厚的人民生活的积累和作者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靠这两者水乳交融的融合，有了这两者的融合，才可能有典型形象的塑造，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因此，只有下决心把旧的一套丢掉，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然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如此，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才可能顺利地发展起来和繁荣下去。

（1977.3.26 于广州）

砌砖铺瓦的精神

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公民都应当掌握一门“武器”，学会一种本领，好为正在建造中的社会主义大厦尽一份力量。这座大厦壮丽而又巍峨，是人类伟大理想的结晶体。但要建成它，需要有人去清理地基，设计图纸；也需要有人去搭脚手架，运送钢材和木料；还得有人去砌墙铺瓦和雕饰门窗。……行业尽管不同，劳动的性质和强度也不一样；可是对于总目标，却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同心协力，各尽所能，尽快地把社会主义大厦建造起来。

文学也是一种“武器”，它的作者自然应当为这座壮丽的大厦献出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应当用诗样的抒情和动人的形象去启迪人民的革命觉悟，用美妙的构思和炽热的语言去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热情。看！这座大厦正在亚洲的东方一天天的耸立起来。文学应当在大厦的每一寸的进展中，献出自己的力量，留下自己的手印；同时，大厦的每一寸的进展也应当正面或侧面地反映在我们优美的诗句中和动人的形象里。

有人说，文学是时代的足音；但是作家如果不把自己的创作活动跟社会的政治运动或经济建设联系起来、不把自己

的创作活动跟人民最美好的理想联系起来，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不但听不到时代的足音，连作品的灵魂和生命都会一起丧失，而变成没有时代气息的形象游戏，或成为卖弄个人主义情趣的陈腔滥调。

是的，题材风格应当丰富多采，要不然，社会主义文艺花园里，就不会万紫千红。但是，如果把这跟社会主义大业对立起来，跟我们时代的伟大理想对立起来，以为要为大厦砌砖铺瓦就不能题材多样化，要题材多样化就不能为大厦砌砖铺瓦。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越是忠于伟大的理想，越对理想的实现抱着最大的热情，也即是越有鲜明的目标感，作家的个性和独创性越能闪闪发光，他的眼界才能越来越广。越是站在目标高处来观察生活，就越容易看清什么是先进的事物和什么是落后的事物。只有你忠于理想，又常常为实现这理想而操心，你才会对社会主义的新事物产生诗意的激情；对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腐朽事物，才能用“破旧立新”的观点去批判它们。正因为站得高，视野就宽阔，因而题材也就愈多样愈丰富。

只要有利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我想，应当着重写当代的重大题材也可以写历史的事迹；应强调反映尖锐的政治斗争，也可以写普通的日常生活；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应当着力去塑造，反面人物也应有适当的反映；应当反映敌我矛盾，也应当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写喜剧，也可以写悲剧；可以热情地歌颂，也可以严肃地批评。题材是十分宽广的。可见主要问题显然不在题材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态度和立场。

如果抱着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厦砌砖铺瓦的精神，对于政治斗争或正面人物的题材，固然能笔下生花；就是偶尔抒写山山水水，草草花花，也会情不自禁地流露革命者的激情和愿望。对于这样的小诗，你能说它没有时代气息吗？

我们都承认“借物寓情”。什么“物”都可以“借”，问题要看你所“寓”的是什麼“情”，什麼“志”。所以，题材不应受约束，但思想感情的倾向，却不应有一丝一毫的忽视。

革命的文学，理应反映出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但是如果一个作者站在先进理想的篱笆外边，只有时探头往里边望一眼；或者把现实斗争和建设与创作活动“隔离”起来，那你能奢望他理解并反映出当代最先进的理想吗？这种精神状态支配下所产生的作品，能有一点时代的精神吗？

怎么办？归根到底，还是要有为社会主义大厦砌砖铺瓦的精神。

（1962.6.20 于广州）

二者必舍其一

——给一位初学写作者的信

《羊城晚报·花地》编者按：我们经常收到青年文艺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的来信。这些来信反映了两种思想情况：一种是怀着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热情和抱负，去对待生活和写作，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如何更好地鼓舞人们去建设祖国。另一种情况，却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去对待生活和写作，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现实斗争漠不关心，终日醉心于个人名利的追求。对于这种迷入歧路的青年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与注意。现征得萧殷同志的同意，将他给一位青年朋友的复信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我们认为信中所谈的问题，是重要的，而且是及时的，希望有类似这种现象的青年人想一想。

……读过你的《春耕前夕》，很觉失望。它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既没有人物的印象，也没有情节的印象；既没有生动的细节描写，也不能给人以任何思想的启发。它只是一大堆支离破碎的、浮浅的、粗糙的生活现象的堆积。而且这